

627

1K250.343

G53

研究生教学用书

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

中国近代文化概论

龚书铎主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文化概论/龚书铎主编.

—北京:中华书局,2002

ISBN 7-101-03227-3

I. 中… II. 龚… III. 文化史-中国-近代-研究生-教材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2253 号

中国近代文化概论

龚书铎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朝阳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开 本 787 × 960 1/16 印 次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6 印 数 1-4000 册

字 数 256 定 价 32.00 元

国际书号 ISBN 7-101-03227-3/K · 1404

前 言

在这本小书即将出版时,有必要就有关的问题作点说明。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化”是什么?长期来众说纷纭,理解各异,单是定义就有二三百种之多。不过定义虽多,人们习惯把它分为两类,即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或大文化和小文化。不论存在着多少种意见,对于从事文化史教学和研究者来说,只能是采取一种意见,否则就无法进行工作。虽然未必为别人所赞同,但既然是意见不一,那就只好按各自的理解去进行研究和撰述。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是按狭义文化来撰写的。具体地说,是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与政治和经济相应的文化。狭义文化较之无所不包的广义文化,所涉的内容要少得多,范围要窄得多,然而也还是很丰富、繁杂的,研究起来也不容易。

研究和撰述文化史,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按整体综合的体例来撰写,还是按具体领域分门别类来撰写。文化不能离开诸如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宗教、习俗等具体领域,离开这些具体领域来谈论文化,文化将成为看不见、摸不着玄之又玄的东西。但是,文化也不仅仅是各个具体领域的简单组合,它要受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约,又影响于社会政治和经济。而各个具体领域也不是孤立的,各不相干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渗透。在近代,还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中西文化在矛盾的过程中又发生吸纳、融会。这种种情况,不是单纯的具体领域分门别类的阐述所能涵括得了的,需要有综合性的论述才能予以较为全面的揭示。照此说来,只有具体领域的阐述,没有综合的论述,或只有宏观的综论,没有具体领域的阐述,似乎都有不足或偏颇。因此,本书包括综论和分述两部分,试图较全面地论述中国近代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

本书系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七五”规划的一个研究项目,课题名称

原为《中国近代文化史》(1840—1919)。考虑到系统写史目前条件还不很成熟,我们的能力也有限,因而采取了专题撰述的体例。全书共分十四章。前四章是综论性的,论述了中国近代文化的特征、发展变化、中西文化的论争,以及“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问题。后十章是对具体文化领域的分别阐述,包括社会思潮、儒学、史学、新兴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教育、自然科学技术、宗教、社会习俗及文化事业和团体等方面。这样的体例,称为“概论”或许较为接近。本书可供文化史研究者阅读参考,也可作为大专院校中国近代文化史课教材。

书中各章的论述,有的是我们长期研究的心得体会,有的则是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学术界在中国近代文化一些具体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撰写这本小书很有助益。没有这些研究成果,这本小书是难以编成的。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陈铮同志为此书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参加本书撰写的,主要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的同志,各章分工执笔情况如下:

第一、二、六章,龚书铎;

第三、四、五、七、八、九、十章,史革新;

第十一、十四章,郑师渠;

第十二章,马克烽;

第十三章,孙燕京、史革新。

全书由龚书铎修改定稿,史革新协助了修改工作。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缺点、错误之处自不可免,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龚 书 铎

1996年6月

附记:

本书于2001年入选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根据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对教学用书的版式、字型等的规定,本书由中华书局重排再版。此次再版,只校订原书的错漏字,未作内容修改。责任编辑任灵兰同志为本书再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表示感谢。

龚书铎

2001年12月13日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近代社会与文化特点	1
一 近代经济的多种成分和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 近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区域性	1
二 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始终同政治变革、救亡图 存密切结合	3
三 近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冲 突及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	6
四 科学与民主是近代文化的核心内容	9
五 近代文化既丰富多样,又肤浅粗糙,没有形成完 整的体系	11
第 二 章 近代文化发展历程和结构变化	15
一 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	15
二 近代文化结构的变化	21
第 三 章 近代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	28
一 洋务运动中的文化论争	28
二 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文化论争	31
三 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论争	35
四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文化论争	40
第 四 章 “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	45
一 “西学中源”说的历史考察	45
二 “中体西用”论的来龙去脉	52
第 五 章 社会思潮	58
一 中日甲午战争前的社会思潮	58
二 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社会思潮	66
第 六 章 儒 学	80

一 儒学趋向于经世致用	80
二 儒学各派的兼采会通	85
三 儒学与西学的会通	90
四 儒学正统地位的失落	95
第七章 史 学	98
一 边疆史地和蒙元史的研究	98
二 外国史地研究的开拓	101
三 当代史的研究和编纂	106
四 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兴起	109
第八章 社会科学新学科	114
一 哲 学	114
二 逻辑学	117
三 伦理学	120
四 美 学	122
五 政治学	124
六 社会学	127
七 经济学	129
第九章 文学艺术	133
一 中日甲午战争前的文学艺术	133
二 中日甲午战争后的文学艺术	138
第十章 教 育	153
一 教会教育的兴起	153
二 清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	158
三 资产阶级及民国初年的教育	165
第十一章 自然科学技术	171
一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科学技术	171
二 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的确立	174
三 近代中国的应用技术	187
第十二章 宗 教	191
一 基督教的东渐	191
二 近代佛教	198
第十三章 社会风俗	208
一 移风易俗的思想主张和实践	208
二 生活习俗的变化	214
三 礼俗的变革	217
四 妇女和婚姻	223
第十四章 文化事业和文化团体	227

一	近代的报刊	227
二	近代的出版机构	231
三	近代的图书馆事业	236
四	近代的文化团体	240

第一章

近代社会与文化特点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动荡变化的 80 年,也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 80 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动,改变了传统社会固有的格局。无论是李鸿章慨叹的“三千年一大变局”,还是曾纪泽所说的“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都反映了这种外来冲击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重大震动。从此,中国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逐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日渐趋于解体,并一步步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同时,中国人民也开始了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的斗争,追求独立、民主、富强的艰辛历程。与社会经济、政治剧烈变革同步,中国固有文化也发生了由旧向新、由古向今的转换,由传统步入近代。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近代文化,也具有它自己的特点。

一、近代经济的多种成分和发展的不平衡, 影响了近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区域性

在中国近代社会里,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包括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等。而资本主义很微弱,一直未能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据有的专家估算,1920 年左右,我国的农业总产值约为 165.2 亿元,工业(包括矿业)总产值约为 53.83 亿元,共 219.03 亿元。如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略去,近代工业的总产值约 10.66 亿元,只占当时工农业总产值的 4.87%。就是说,到本世纪 20 年代初,我国资本

主义发展的水平还只有5%左右。^① 社会经济的基础部分仍然是小农经济。而且近代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沿江的大城市,广大农村占支配地位的是小农经济。毛泽东对中国近代经济的特点曾经做过精辟的论断,他说:“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② 这种经济形态的特点,不能不影响着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

一、由于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不可避免地文化上反映出了复杂性。既有资本主义文化,又有封建主义文化;既有殖民主义文化,又有爱国主义文化。既有西方近代文化,又有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新文化,又有旧文化;等等。各种文化既有互相矛盾冲突,也有互相制约、影响,甚至有互相结合或融会的。但是,不论其如何错综复杂,从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看,资本主义新文化是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向的。

二、近代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近代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在东南沿海和沿江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出现了一批具有近代性的都市。这些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社会风气也日渐开放。因此,出现了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出现了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一批先进的人物。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开创者或奠基人。然而,在广大内地、农村,经济基础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仍然是受封建经济的支配。相应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依旧是笃信“圣经贤传”,笃信封建纲常名教是天经地义,万古不易。由于缺乏近代经济基础,这些地区接受西学、新学的过程十分缓慢,举步维艰。随着沿海地区近代经济的发展,与内地的差距越来越大,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也越来越明显。例如,清末留学高潮中,甘肃全省留日学生只有一名,而新疆、青海、宁夏几乎近于零。沿海与内地相比较,相去悬殊。

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微弱,封建地主经济成分的强大与占主体地位,造成了近代新文化缺乏坚实牢固的经济基础。近代文化的主体承担

^①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第33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者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第三等级,而是与封建社会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传统士大夫中的一些开明之士。他们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由于近代民族危机的加深,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认同西学,学习西学,并试图以之作为变革社会、振兴中国的一剂良药。然而,由于近代社会的局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微弱,使得他们缺乏完全摆脱封建士大夫传统思想意识和习气的土壤,没有能够完成从传统士大夫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彻底转变。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新与旧之间徘徊。在变革的进程中,他们大都积极参与,并以其杰出的才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的前进。但是,一旦变革出现挫折,现实与理想发生背离,他们便退缩、消沉、颓丧,从对传统的批评又回到对传统的眷恋。康有为、严复、章太炎、刘师培等晚年思想的保守倒退,便是近代经济在文化上折射的例证。

二、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始终同政治 变革、救亡图存密切结合

近代中国 80 年,是中国人民受尽屈辱、灾难深重的 80 年。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每一次战争都以清政府失败并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每一次战争都使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的历史深渊。同时,每一次战争也使国人产生震惊和民族危机感,爱国主义的精神日益增强,“救亡图存”之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要救亡图存,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独立、民主、富强,始终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近代中国出现的一切问题,无不与这一主题息息相关。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也不例外,同样受到政治变革、救亡图存的影响。无论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郑观应的“商战”;无论是康有为的君主立宪,还是孙中山的民主共和;也无论是“实业救国”,还是“教育救国”、“科学救国”,都是围绕着救亡图存展开的。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①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无论中西古今,都必须在时代和社会的需要面前接受检验、抉择。在五四运动以前的几十年中,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很大的有两个理论:一是进化论,一是民约论。进化论以生存竞争的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62 页。

论适应了救亡图存、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民约论以天赋人权的观念适应了要求民权平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

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朝野震动，举国哗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感，弥漫华夏。有识之士大都认识到这一点，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①又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②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严复“大受刺激，自是专致力于翻译著述”。^③他翻译《天演论》，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优胜劣败法则，正是适应当时救亡图存、奋发图强的需要。甲午战争后，进化论为人们所接受和崇信，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这种现象持续了二十余年，直到五四运动前后，在中文报刊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进化论的词句为时人所习见，各种介绍进化论的书籍竞相出版。胡适《四十自述》中的一段话，比较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接受进化论的社会心态。他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上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以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般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做杨天择。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我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驊。有一天的早晨，我请我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胡适’二字。”人们对进化论如此沉迷，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严酷的现实。于是外来的进化论原则便同传统的保国、保种产生了认同和共鸣。戊戌维新既是一次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也是一次文化革新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救亡诱发了启蒙，救亡推动了启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不可能脱离严峻的现实而孤立地建构近代文化。近代文化只能在近代社会现实的土壤中产生和发展。

同样，“天赋人权”论在甲午战争后的传播也是适应了现实社会的需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13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1页，中华书局1954年版。

③ 严复：《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48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要。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民权平等为维新志士所提倡。梁启超认为:“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原。”^① 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国“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② 也就是说,只有兴民权才能救中国。辛亥革命时期,民权平等的思想更为流行。卢梭的《民约论》全译出版,刘师培以《民约论》的思想与人合编了《中国民约精义》一书。革命党人认为民权是最要紧的,“世界万国,以有民权而兴,无民权而亡者,踵相接,背相望”。中国“之所以能脱之、倾之、去之、除之、复之者,在种吾民革命之种子,养吾民独立之精神,而可一言以蔽之曰:民权而已。”^③ 他们还提倡男女平权,认为“女权愈振之国,其国愈文明,女权愈衰之国,其国愈衰弱”。^④ 革命党人也是把民权看作是振兴中华的关键。民权论的流行,同样是适应了为反对清政府腐朽专制统治造成中国衰败的需要。

政治变革、救亡图存也影响了文化的各个领域,从哲学、教育、史学、文艺,到体育卫生、社会风俗习惯等,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单以文艺中的诗歌为例,就可以具体说明。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谭嗣同的“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从丘逢甲的“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到秋瑾的“拼将十万头颅血,敢把乾坤力挽回”,无不表达了作者共同对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忧虑,对河山破碎的无限悲愤,和救国救民的豪情壮志。黄遵宪是近代诗坛的一面旗帜,他的诗作更是表现了民族正气、爱国情感和救亡意识。

近代政治变革、救亡图存的运动推动了文化的革新运动,而文化的革新反过来又为政治变革、救亡图存服务。从近代文化中贯穿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看出近代政治的发展推动了近代文化的发展,二者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它 also 产生一些消极作用。近代 80 年政治事变和运动频繁交替,思想文化变化很快,当时的维新思想家或革命家都要求文化为政治斗争服务,但出现了过分的功利主义,存在简单化的偏向,对文化本身的价值和特点重视不够。正因为把文化简单地看成政治的附庸,忽视了文化的独立性,从而影响了它的成就。例如,晚清小说创作很多,好的作品却很少,戏剧也是这样,失去了生命力。

① 《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 128 页。

② 《学堂日记梁批》,《翼教丛编》卷 5 第 5—11 页,光绪二十四年(1898)武昌重刻本。

③ 《二十世纪之中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上册第 70、69 页,三联书店 1960 年版。

④ 《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下册第 924 页。

三、近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冲突及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

近代中国文化同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道路不一样。欧洲的资产阶级文化是在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基础上兴起的。从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15至16世纪进一步发展,17世纪兴起科学运动,18世纪法国开展了启蒙运动,之后德国又出现了以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为代表的古典哲学。欧洲的资产阶级文化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则与此不同。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经济基础、政治力量,以及思想文化条件。就以思想文化的情况而言,18世纪正当康熙后期至乾隆年间,清朝统治者加强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利用修《四库全书》禁毁、删改书籍。同时引导知识分子埋头于科举八股和繁琐考据,使人们严重脱离实际,思想铜蔽僵化。这种状况,与蓬勃发展的法国启蒙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文化没有在自己的社会内在发展中走向近代,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引起了变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又互相会通融合,形成了资产阶级新文化。

西方文化传播进来后,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矛盾冲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数十年间,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了侵略,掠夺中国财富,压迫、剥削、杀害中国人民,激起了中国人对西方侵略势力和外来事物的仇恨。而西方文化正是和西方列强的鸦片、炮舰等一起涌入中国的,其中的某些方面又是用来作为侵略的组成部分,因而使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中国人在谴责外来侵略的同时,也排拒了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两种文化的模式和形态截然不同,在价值标准、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习俗乃至心理感情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的差异。长期生活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并深受封建伦理纲常熏陶的人,对西方文化是难以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抵触,是很自然的事。这是任何两种异质文化相遇都可能会出现的情况。还要看到,近代输入的西方文化并不都是精华,而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夹杂着大量腐朽性的糟粕,诸如弱肉强食的侵略理论、白种人至上的种族论、欧洲中心论,以及西方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等等,传入中国有害无益,遭到中国人的抵拒是理所当然的。

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接触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矛盾和冲突,有

时表现得很尖锐。这种矛盾冲突带有普遍性,不仅表现在统治阶层中,而且还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以及下层民众中反映出来。譬如人所熟知的,1867年关于在同文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就在清廷王公大臣中引起一场大争论。大学士倭仁等守旧分子“以道学鸣高”,反对科甲正途人员“师事夷人”,学习天文算学,认为这样一来必将“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高唱“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櫓”^①,就反映了士大夫阶层中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持保守立场的人的观点。两种文化的冲突在农民起义内部或与统治阶级之间也有反映。太平天国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接受了基督教文化,宣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大家都是上帝的子女,男的都是兄弟,女的都是姊妹的思想。这种思想触犯了封建伦理道德,把君臣、父子、夫妇等尊卑贵贱秩序颠倒了。这当然与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不相容,也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曾国藩组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布《讨粤匪檄》。檄文中攻击太平天国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②他以此来号召和吸引地主阶级当中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人集结在他的旗帜下,反对太平天国,卫护封建文化。这说明太平天国这场农民起义反映了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当然,后来曾国藩也有变化,成为洋务派,接受了某些西方文化。

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教案”,反教会斗争一直不断。外国传教士到中国设立教堂,其中有些人横行霸道,充当间谍,到处搜集情报,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人民反对利用教会进行侵略的斗争是爱国的,无可指责的。但这类斗争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有中西文化冲突的色彩。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在这里突出地表现出来。在信仰上,前者主张敬拜上帝,后者主张敬孔祭祖,两者是不相容的。湖南士绅周汉在19世纪90年代曾经创作了约40多种反基督教的宣传品,流传甚广,为长江教案的发动起到很大鼓动作用。张之洞称:“湘鄂两省,赞周(周汉)之歌谣者,十人而九。”^③周汉所写的反洋教宣传品,除了揭露外国教会教士的不法行为、危害中国的罪行外,大量的则是从信仰、道德、习俗的角度抨击基督教的“异端邪说”,如《谨遵圣谕辟邪全图》、《儒释道三

① 《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第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②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32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③ 《张文襄公全集》卷137,电牍16第4页,北平文华斋民国十七年(1928)本。

教弟子公议防驱鬼教歌》、《鬼教该死》等,都大肆渲染了中国传统儒学与洋教在信仰上的水火不容,折射出两种异质文化在观念形态上的对立与冲突。因此,从文化史角度看,“教案”除具有人民群众反对外来教会侵略、压迫的性质外,还包含着不同文化心理、感情、习俗的冲突。这里既有民间老百姓,也有绅士和官僚。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都具有相同的传统文化心理:尽量防守自己的传统,不要受外来文化影响。从戊戌维新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文化的冲突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泛,影响也更深刻。

中西文化间有矛盾冲突,同时也有会通融合。所谓会通融合是指异质文化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吸引及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因素的吸收、消化。任何文化如果置于封闭的环境中,不与他种文化接触、交流,自在自足,孤芳自赏,其结局必然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耗尽活力,自生自灭。只有通过不同的文化的交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才富有活力,永葆青春。英国民族学家里弗斯说:“各族的联系及其文化融合,是发动各种导致人类进步的力量主要推动力。”^① 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贯穿在整个近代,1895年中日战争后就更加明显了。那时,一些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提出这样的主张。最初是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口号。在他们看来,传统文化是毫无疑问的,所缺乏的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后来,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采西学”、“制洋器”,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宗旨。这些都是近代早期表示认同西方文化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反映出中西文化会通融合的趋向。到洋务运动时,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原则。其意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本体,不能变动,在这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中可以利用的部分,即技艺。“中体西用”论用中学来包融西学,尽管是片面对待中西文化,在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属于较低的层次,但它毕竟适应了中国当时的发展趋向。“西学为用”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认同只局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表面阶段,然而没有这一阶段,也就无法向前发展。“西学为用”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潮流,对社会缓慢地产生影响。虽然缓慢,但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伦理纲常,却构成冲击。到中日甲午战后,国人的思想又前进一步,不再是原封不动地保持传统文化,而是扩大了吸收西方文化的范围,对西方的进化论、民权思想和政治制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政治理想,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方案,便是此期国人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主张。在

^① 引自(苏)C·A·托卡列夫:《外国民族学史》第1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此时,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因素,发生重大变化,以致在甲午战后中国出现了新的文化运动,即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达到高潮。

从个人的情况来看,如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孙中山等人的思想,都表现出对中西文化不同程度的会通融合。而且,他们也都主张会通融合中西文化。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提出:“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① 严复则指出:“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② 后来,孙中山也强调:“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他在概括自己的学说时指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③ 孙中山关于融合中西文化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有选择而不盲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如此,最终是自己的创造。他的三民主义学说是在融会中西文化的基础上以自己的独见而创立的,是这个时期中西文化融合的典范。

四、科学与民主是近代文化的核心内容

在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相对说来比较单一,基本上是以儒学或儒、释、道为其主要内容。到了近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儒学地位的衰落和西方文化的传播,形成了近代文化的新内容。由于近代文化形成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发展源流不同于古代文化,因此,近代文化的内容同样不同于古代。经过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传统儒学衰落,旧的文化体系解体,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文化因素和文化部门。声光化电、民主自由、新式礼仪习俗等等,纷纷展示在人们面前。那么,近代文化的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用一句话来概括,即科学和民主。

科学和民主虽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口号,实际是对近代文化基本内容的概括。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伊始即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④ 后来,“人

①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9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60页。

③ 《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④ 陈独秀:《敬告青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78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权”改提为“民主”。他坚定地相信：“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① 这里所说的科学和民主，都是从广义上讲的。科学既指自然科学，又包括认识事物的科学法则、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民主的含义同样广泛，既包括近代民主制度、民主精神，又包括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解放和变革。这两个方面，基本上涵盖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内容。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科学和民主的口号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先进的中国人都在为此孜孜探索。关于科学，在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到洋务运动时，国人进一步认识到还要学习声光化电等近代科学技术。在“中体西用”的旗号下，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经济技术最先被吸收进来，成为近代文化的基本内容之一。甲午战争后，以严复在《天演论》序言中提出学习科学的方法论，直至主张学习社会科学各方面的知识，反对愚昧迷信的思想等，深化了人们对科学的认识。人们不再把科学只看作具体的科技知识，而且还包括科学法则、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等深层次的内容。所有这些，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的口号作了长期的准备。

民主在近代中国，首先表现为一种新的政治要求，即对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向往。鸦片战争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介绍了西方的议会制度。19世纪60年代以后，介绍议会政治、民主政治的著作渐渐多了起来。不过，此时的赞同者选择的是君民共主政治。他们认为，民主权偏于下，君主权偏于上，君民共主权得其中。所谓君民共主实指君民不隔，是一种次民主政治。1895年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维新运动，要改变清王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这场变法运动虽然遭到封建统治者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但在政治上、思想文化上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守旧势力和传统文化，为近代的政治变革造了舆论，推进了近代民主化进程。在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不仅希图进行政治制度的变革，而且在思想上宣传民权平等，在知识界中有着重大影响。资产阶级文化的民权平等，同封建文化的纲常名教不相容。张之洞就竭力反对民权说，他在《劝学篇》中鼓吹“君臣之义，与天无极”，扬言“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无一益而有百害”。从反面可以看出，民权平等思想对封

^①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318页。